

# 東瀛華蹤

朱龍興

## 〈長崎貿易圖冊〉中的華人住所



院藏〈長崎貿易圖冊〉以圖文並陳的方式，呈現十八世紀華人至長崎經商的經過。由華商所經營的唐船，近者由江、浙出發，遠者從閩、粵起航，更遠者甚有自東南亞安南（越南）及暹羅（泰國）等地而來，這些商船在季風的護送下，緩慢北移至當時日本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口——長崎。有關清代華人在長崎貿易的歷史討論，學界中已見豐富的研究成果，相較之下，華人在長崎生活的視覺圖像則尚存許多討論的空間，本文即試著以院藏〈長崎貿易圖冊〉為基礎，透過相關圖像的比對，除了進一步分析〈長崎貿易圖冊〉中華人活動的空間、創作的目的與描繪的年代，藉由此圖冊的研究，同時希望能增加外界對華人在長崎生活的理解。

### 華人在長崎的歷史紀錄

長崎何時始見華人蹤跡呢？根據西川如見（一六四八—一七二四）所編的《長崎夜話草》（一七二〇）指出唐船初抵長崎，乃永祿五年壬戌之年（一五六二）；另外熊野正紹的

《長崎港草》（一七九二），則指

舊名「深江浦」的長崎，在永祿元年（一五五八）時便有「明舟載貨財以求交易」。（註二）二則史料描述華人之至長崎的確切年代雖有些許出入，但可以確定的是，華人在一五七一年成

為國際貿易港之前即有可能往來於長崎，並在葡萄牙人來此定居開埠後，維持穩定的貿易關係。近年，在長崎早期市街的考古出土報告中，可以發現大量的明代青花瓷器，相當程度地呼應了史料上的記載。（註二）



丟票 〈長崎貿易圖冊〉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 南京寺 〈長崎貿易圖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丟票 〈長崎貿易圖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那麼來長崎經商的華人怎麼解決住的問題呢？一開始，來訪的華商宿於當地民衆的住家中，日華雙方簽訂合約，這種稱爲「差宿」的居住方式一直施行到寬文六年（一六六六）。後來，基於管理所需，日方安排各町輪流負責華商的居住，這樣的制度稱爲「宿町」。清康熙在一六八四年頒布展海令之後，到訪長崎的華人急遽攀升，德川幕府爲有效管理走私問題，一六八八年九月開始在長崎十善寺村的藥園空地建了限制華人活動範圍的社區，隔年春天便告完成（註三），這個華人社區在日人口中被稱爲「唐人屋敷」、「唐館」、「華人邸舍」、或「唐人屋舖」。

### 越洋傳訊

長崎建造華人住宅的情報隨即傳回中國，一七〇三至一七〇四年在寧波活動的耶穌會洪若翰神父（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在寫給拉雪茲（François de la Chaise, 1624-1709）的書信中便提及唐人屋敷的情景，文中說中國人的住地建在一座山坡上，

平面上分有兩個院子，第一個院子是日本人前來向中國人兜售其商品的地方，第二個院子包括九排像小客棧一樣的房子，每排房子有七個房間，中國人得以自由地進入其住處的第一個院子，但不允許他們離開其住地。松浦章認爲這些訊息可能來自康熙四十年前後（一七〇一）清宮指派莫爾森在長崎所獲得的消息，換言之，十八世紀初康熙在位時的清宮即對長崎華人住宅有相當的認識。對於長崎唐館的注目，可從雍正朝浙江總督李衛的奏折中可以看出關注的持續性，在雍正六年李衛的一份奏折中提及：

：平常貿易之人，到彼皆圍禁城中，周圍又砌高牆，內有房屋，開行甚多，名爲土庫。止有總門重兵把守，不許出外閑走，得知消息。

同年另一份奏摺中，李衛依據長崎行醫的朱來章的口述中再奏：

此處（長崎）夷人築牆立柵，名爲土庫，凡中國人到彼，俱住其中，撥兵看守，不許私自出入。

另外，於雍正七至九年（一七二九—一七三一）任職蘇州知府的童華在後

來寫成的《長崎紀聞》中亦有長崎唐館的記載：

初洋商到倭，分住各街，往來無節。繼則止令住大唐街一處，而街之居民復厭苦之，乃置土庫一所，名曰唐人館，實土牢也。三面背山，一面臨海，搜查明白，人貨俱入庫中，重門嚴守，不聽出入。

（註四）

院藏〈長崎貿易圖冊〉中，並沒有以「唐館」或「唐人屋敷」爲主旨的頁面，描述華人住宅的文字見於「南京寺」一頁中（圖一），該頁敘述當華人下船在南京寺遊玩一天後，便「回庫居住，大門口有插刀手看守，二門外有通事街官坐班，在庫客商只許二門外行走，不准出大門，防守甚嚴。」綜合看來，在各文字記載中對華人住宅的描述皆保有相當的一致性，其中稱爲「庫」或「土庫」監牢一樣的地方應該就是日人所稱的唐人屋敷，然而，文字的敘述僅能提供唐館有限的訊息，透過圖畫的描繪方能展現華人住宅完整的面貌。



圖4 開漆器店 〈長崎貿易圖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傳渡邊秀石 唐館圖卷 紙本設色 神戸市立博物館藏



圖3 丟票 局部 〈長崎貿易圖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 大門(表門) 2. 大門與二門中的空間 3. 日本官員住宅(乙名部屋) 4. 水井 5. 通事街官  
6. 告示板(御製札) 7. 內門 8. 工具房(腰掛) 9. 福德宮 10. 浴室 11. 華商住宅

遠端遙看

在描述長崎唐館的頁面中並沒有與之對應的圖像並陳，華人住宅的描述出現在「丟票」(圖二)一頁。(註五)在「丟票」中，畫家以俯瞰的視角將

外圍方折的唐館置於畫幅中央，利用上下位置塑造出縱深的空間。圖畫下緣接近觀者處是華人社區的大門，隨著視線上升，逐步進入館內。如同冊頁文字所載，穿過唐館的大門後，即

屬華人的活動範圍，往前行可見建物依牆立於左右二側，右方所見是日本官員居住的「乙名部屋」及「通事部屋」，往左則看見屋內有一群人對著貨物席地而坐，似乎正對某些物品進行討論與交易，所從事的活動也許就是本頁的主題——「丟票」。繼續往內門方向前行，經過一口水井後，可見一名男子跪坐在屋內(日文稱此屋為「改所」，即出入人員的檢查哨所)面向往來的人們，這應該就是圖冊文中所指「通事街官」，在此檢查出入人員。上了階梯可見內門旁立著告示用的木板(日文稱「制札」，一般而言制札指的是置於寺廟入口旁或路旁用來告知禁止事項的木牌)，說明唐館應該遵守的規定，包括：無通行牌的華人不得外出、非青樓女妓不得入內、還有僧侶修道人及行乞者禁止入內等規定。通過內門，就是華人居住的地方，一進去可見到左側有稱為「腰掛」的平房，專門用來置放消防用具或船具，續往前行，穿過二支耀眼的紅色旗桿，踏上架於半月池的小橋，眼前就是「福德宮」(也是俗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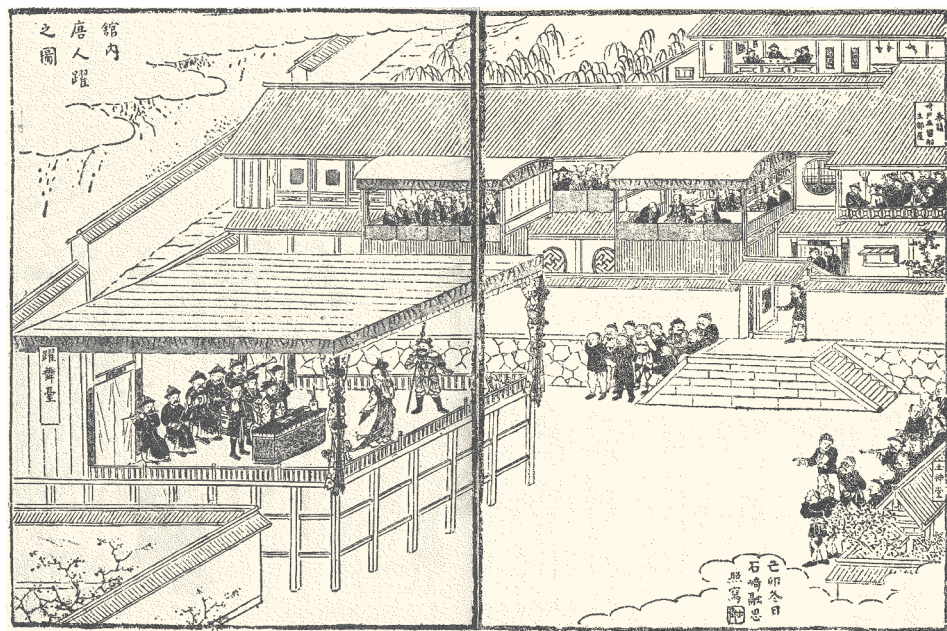


圖7 《長崎名勝圖繪》 唐人館內羅之圖 引自鏡田諭義編，《長崎名勝圖繪》，存於：《長崎文獻叢書·第三卷》，長崎：長崎文獻社，1974，頁100-101。

較高等級的人員則住在設有陽臺的二樓。(註六)(圖三)當面對房舍時，可以發現左側繪有三處石階，暗示出這個住宅群的地基建立在斜坡之上，連同周邊起伏的山丘交待出唐館周圍的整體地勢，以上這些特徵都使「丟票」一景中的「唐人屋敷」成了極易辨識的空間肖像。

在整個貿易的過程中，唐館大門與二門之間可謂是最精彩的空間，除了上述的「丟票」在此交易，在「開漆器店」一頁中有文字提到「丟票出貨後在館內開洋漆銅器店數日」，經過比對，顯然館內的「洋漆銅器店」即開設於大門與內門之間。畫家為了讓視線更容易進入到棚架下的賣場，以順時鐘方向轉換了〈丟票〉中二門間空地的觀察視角，以使棚架下的展示更見清楚。(圖四)這個特殊的「洋漆銅器店」，日人以「伊萬里店」稱之。除了「開漆器店」，這個場景也出現在其他由日人所繪的畫卷中，在傳為渡邊秀石(一六三九—一七〇一)所繪的〈唐館圖卷〉中(圖五)，除了高聳的棚架外，包括

通事的屋舍、屋舍旁的水井、以及水井上方的店舖等，皆與圖冊「開漆器店」的擺設相同。(圖六)不同的是，圖冊中的交易之物集中在漆器與銅器，但對於〈唐館圖卷〉而言，除了價值不菲的器物外，華人日常所需的食物、雜貨等亦是描繪的重點。

**清宮之外的唐館圖畫**

上述的〈唐館圖卷〉中，除畫中景物與「開漆器店」相互輝映外，對於唐館的描繪更為〈長崎貿易圖冊〉中的華人住所作了最佳的註解。畫卷一開始最先呈現唐館的底端，隨著畫幅向左開展，觀者依續經過水塘及一幢二層樓的住宅，透過二樓的開窗，可以清楚看見身著清裝的華人飲食交談與彈樂自娛，接著，便到前有半月池的「福德宮」，土地廟前掛著「配天」、「啟德」二旗，再往前行，便可見到「腰掛」屋內的工具擺設，出了唐館的內門，最後所見到的空間即為圖冊「開漆器店」中的景緻。

在大庭脩所編的《長崎唐館圖集成》一書中，收錄了近三十筆以

屋舍中，內部隔成數間空間的長形建築)，每棟住宅皆為二層樓結構，一般來說，一樓供給船員居住，船長等

的土地公廟，日文有時以「土神堂」稱之)，寺廟後方有叢樹林，此時正好有一位男子自樹後挑水而出，暗示

出樹後應是一處水塘(日文稱為「水溜」)，挑水的男子走向位於唐館右後方的浴室(日文稱「風呂屋」)。

在進入館行走路線的左側，可以見到十數棟分三行排列的長形建物(日文稱為「長屋」，長屋指的是在一長形



圖6 上：〈唐館圖卷〉局部 下：開漆器店局部  
1. 大門 2. 洋漆銅器店棚架(伊萬里店) 3. 水井 4. 店舖 5. 通事街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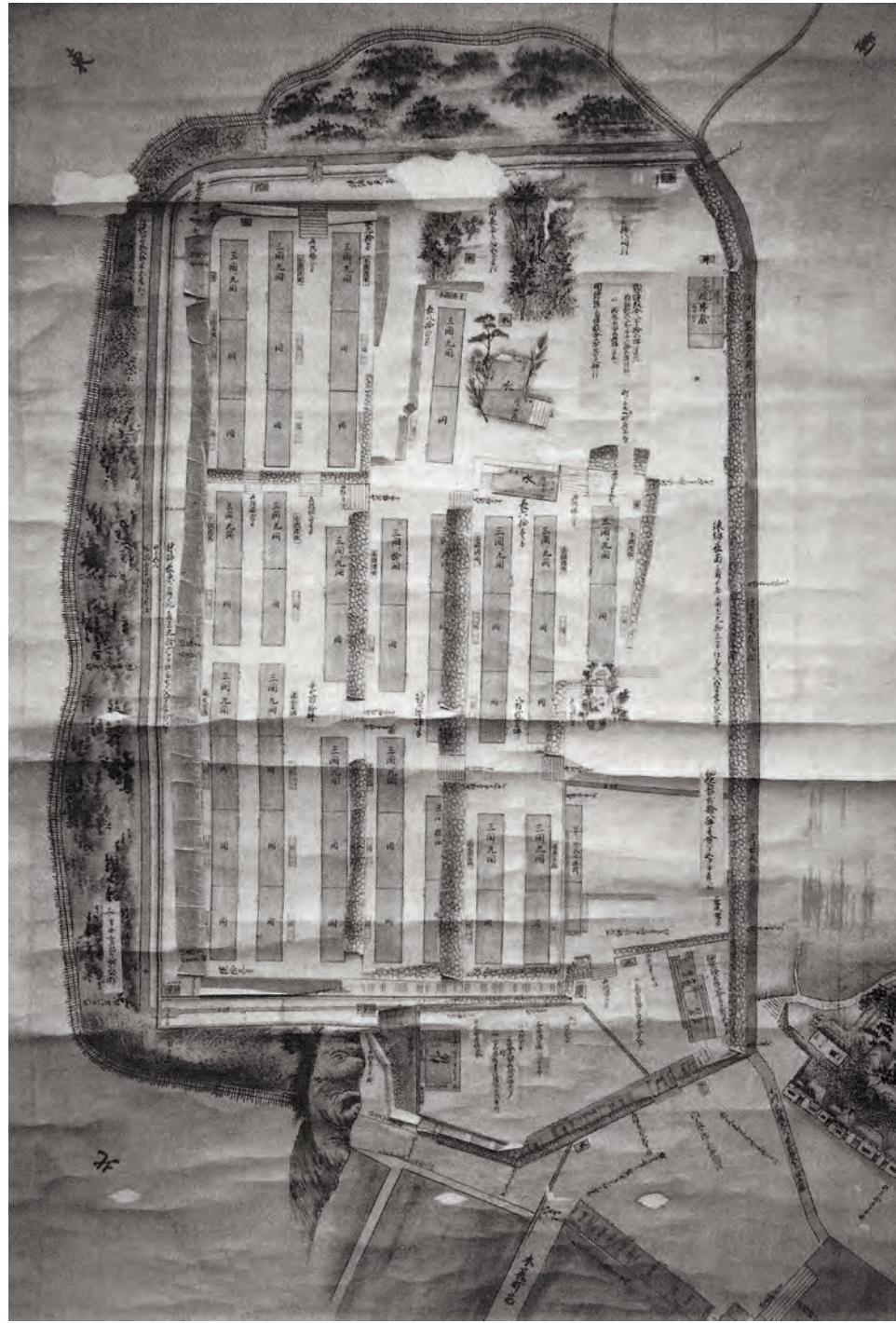


圖10 御普請方屋敷圖 長崎縣立圖書館藏 引自大庭脩，《長崎唐館圖集成》，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2003，頁220。

空間，隨著畫卷的推移，逐步走出大門之外，後者則先描繪新地倉儲，再由大門進入到唐館內部。（註七）不

論是哪一種型態，畫作在空間的處理或人物活動的描寫上均十分細緻，頗有貼近現場觀察的味道，不過因為這

類數量不少的作品彼此相仿，透露出這些畫作對華人生活的描繪並不完全是依現實而紀錄，反而更接近一種印

「唐館」為題的圖畫作品，成澤勝嗣依其內容及布局分為二種型態，第一型以唐館為主要描繪區域，由卷首至卷尾大致描繪：竹林及浴室、水塘、

餅舖及酒舖、華人屋舍（內含宴席及演奏活動）、土地公廟、博奕、船具置放處、內門、哨所、雜貨場（伊萬里店）、大門等；第二型主要增添了

新地的倉儲（新地荷物藏，即現今的新地中華街）。二者對於唐館的內容大致相同，但展開的方向剛好完全相反，前者在卷首先展示唐館最深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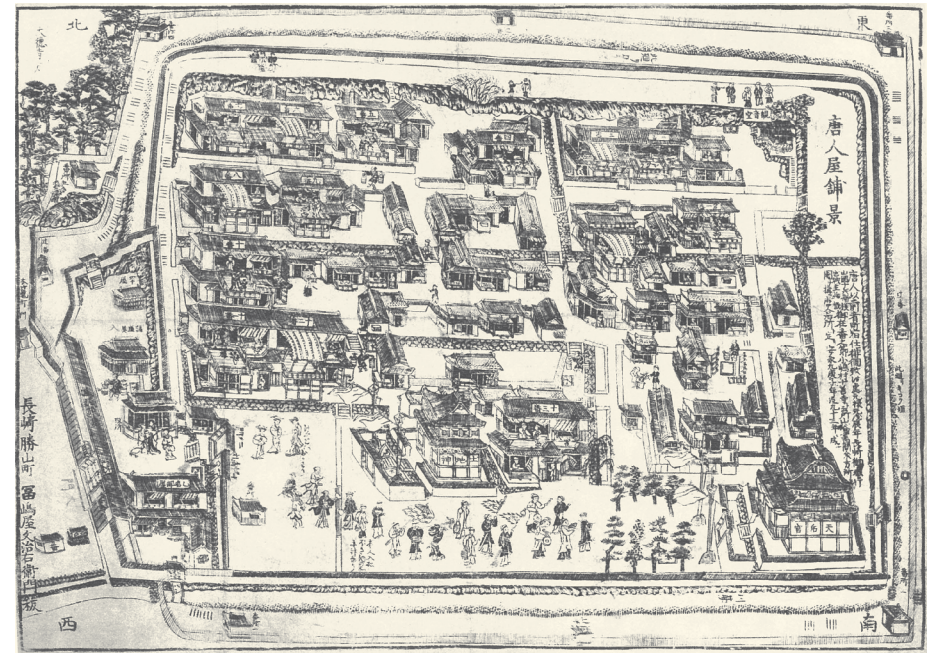


圖8 唐人屋鋪景 安永九年富島屋文治衛門版 引自N.H.N. Moday, A Collection of Nagasaki Colour Prints And Paintings, Rutland and Tokyo: Charles E. Tuttle, 1969, Plate. 33.



圖9 唐人屋鋪景 德州大學圖書館藏（University of Texas Libraries） 引自[http://www.lib.utexas.edu/maps/historical/titsingh\\_chinese.jpg](http://www.lib.utexas.edu/maps/historical/titsingh_chinese.jpg)



圖12 唐館內門 重要文化財 目前存於長崎興福寺 作者攝

過唐館外貌的比對，提供了推測〈長崎貿易圖冊〉完成年代的可能性。唐館建成後，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歷幾次大火及擴建，整體的外觀也跟著改變。其中，唐館南側新建的天后



圖11 長崎華人住宅遺址的石橋及大門 作者攝

象式的刻板描繪。有趣的是，這些繪卷雖然主要出自官方畫家——「唐繪目利」之手，但或許華人生活所傳達出的異國情調過於迷人，以致於不少當地的民間印刷業亦以唐館為主題刊行出售，例如亦為唐繪目利的石崎融思（一七六八—一八六四），其描繪唐館的畫作便為《長崎名勝圖繪》一書所刊載（圖七），除了書冊或手卷，

十八世紀亦可見以唐館為主題單張版畫，長崎勝山町的富島屋於一七八〇年出版了單張的〈唐人屋舖景〉版畫（圖八），作為販售給來訪長崎旅客的紀念品。此張〈唐人屋舖景〉顯然不只受到日本遊客的喜愛，時任荷蘭商館館長的蒂進（Isaac Titsingh, 1745-1812）將此作加上英文另外翻印（圖九），使得長崎唐館跨越時空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

### 畫作的意圖與可能的年代

江戶幕府與大清帝國雖無正式的外交關係，然而不論是康熙或雍正即位時，皆積極地搜羅長崎華人貿易的相關情報，筆者推測院藏〈長崎貿易圖冊〉應該就是在此背景下所收藏進入清宮的作品。至於傳為渡邊秀石（一六三九—一七〇七）所作的〈唐館圖卷〉（註八），其目的亦是官方畫家監看華人活動的產物。換言之，二者皆藉由視覺圖像提供上位者對華人文宅的瞭解。如此一來，作品主要扮演的角色便在於訊息的傳達，而較少以賞心悅目的視覺效果為目的。大

部分唐繪目利在呈現華人住宅時以手卷的形制，隨著畫卷的展開，以移動視點的方式將唐館底部至大門的建築與活動逐一陳列，然而，由於畫幅僅能提供有限的縱深空間，以致於無法完全展現另一個軸向的景深，使得成排住屋的特殊結構無法為看畫者所理解。相對地，院藏〈長崎貿易圖冊〉的畫家為了使觀者能全覽唐人居屋的形態及細部，先以俯瞰的方式將唐館全貌繪於方形的冊頁上，接著再從另一個角度，近距離將大門與二門之間的空間形態與貿易活動呈現於觀者眼前。如此一來，觀者除能先對唐館有全盤的瞭解，也能仔細觀看當中的局部細節。最特別的是，畫家為了強調華人住宅一致性的面貌，捨棄了近大遠小營造空間的法則，而以類似印模般的技法，將畫中的長形住屋整齊地排列在畫面上，若只觀看建築側面，便不難發現大小面積皆幾乎一致，這些繪畫上的特徵，都可看出畫作不以視覺效果為目的，而以傳達完整資訊作為主要的創作意圖。

正是這種如實描繪的特質，透

宮成為重要的指標，這棟由南京商人於一七三六年時所籌建的地標建築，成為判斷唐人屋敷圖的分期依據。將一七八〇年的〈唐人屋舖景〉與更早完成的〈唐館圖卷〉相對照，便可以發現畫內天后宮的有無，成了最明顯的差異。在〈唐館圖卷〉中，福德宮後方除了華人住屋外便是一座「型」的水塘，然而在〈唐人屋舖景〉中，原來水塘的位置已被改建為華人住宅，更往南側則可看到後來建成的天后宮。天后宮的重要性不僅止於顯眼的外貌，更多來自於精神的寄託，在〈唐人屋舖景〉的天后宮前方，可見身穿清朝官服的行列，在敲鑼打鼓以及三角令旗的前導下，準備將神像送至天后宮安放，由此可見天后宮在完成後，具備實體及精神上的指標意義。

筆者認為以唐館的天后宮為對象，或許便能大膽推敲〈長崎貿易圖冊〉描繪唐館的年代。首先，從圖像上來看，〈長崎貿易圖冊〉中未見後方有天后宮的存在；其次，在〈南京寺〉的文字描述中提及：「一切貿易船隻俱供天妃，起貨完日，在船

客商將神像擡送南京寺祭祀，聽眾商在寺遊玩一日。」二項資料說明了在〈長崎貿易圖冊〉完成之時，唐館內應尚未有安置天后神像的寺廟，因此才需將船上的神像安放在市中的南京寺。這樣的情況與永井規男氏的研究相符，永井氏在判斷唐人屋敷的分期時，認為唐館天后宮的設置原因便在於減少華人外出市街的機會，以貫徹來航唐人與日本民衆的隔離政策。此外，他以唐人屋敷平面圖為材料，指出前期（一六八二—一七三五）華人住宅群的分布明顯分為三行且較為密集（註九），在比對之下，〈長崎貿易圖冊〉中的長屋數量幾乎與早期的平面圖——〈御普請方屋敷圖〉在排列或數量上皆近乎一致。（圖十）最後，若再就住宅的細節來看，不難發現隨著時間的進展，華人將住屋的陽臺刻意擴建，將〈長崎貿易圖冊〉中住宅的陽臺與〈唐人屋舖景〉並列比較，可以看出《長崎貿易圖冊》的華人住屋反映出早期的建築特徵，以上幾項重點都足以說明〈長崎貿易圖冊〉完成年代的下限不應晚於一七三三年。

- 註釋
1. 二則史料分別見西川如見著，飯島忠夫、西川忠幸校，《町人囊·百姓囊·長崎夜話草》，東京：岩波書店，一九四七，頁二四七；熊野正紹，《長崎港草》，收於森永種夫、丹羽漢吉校訂，《長崎文獻叢書第一集第一卷》，長崎：長崎文獻社，一九七三，頁一三。
  2. 例如在長崎縣廳附近的考古挖掘中，最早期的出土瓷器中，中國產的瓷器便占了百分之九五·七，見長崎縣教育委員會，《長崎縣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一二三集—万才町遺跡》，長崎：長崎縣教育委員會，一九九五，頁一六—一三。
  3. 參見劉序楓，《德川「鎖國」體制下的中日貿易：以長崎「唐館」為中心的考察（一六八九—一八六八）》，存於：海洋史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港口城市與貿易網絡》，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二〇一一，頁八七—八八；田邊茂啓，《長崎實錄大

- 成》，長崎：長崎文獻社，一九七三，頁二四七。
4. 請參見松浦章相關研究，包括：〈杭州織造烏林達莫爾森到訪長崎—清朝康熙年間中日交流的一個側面〉、〈雍正年間清朝官吏的日本觀〉、〈中國史料中的長崎貿易〉，分別存於：松浦章著，張新藝譯，《清代帆船與中日文化交流》，上海：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二〇一一，頁四九—六一，八〇—九四，一五一—一六三。有關洪若翰神父書信的中譯本請見：〈耶穌會傳教士洪若翰神父致國王懺悔師、本會可敬的拉雪茲神父的信（一七〇四年一月十五日于倫敦）〉，存於：杜赫德編，鄭德弟、呂一民、沈堅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上卷》，鄭州：大象，二〇〇五，頁二〇〇—二〇五。
5. 有關「丟票」中唐人屋敷的辨識，主要獲致於中原大學建築系黃俊銘老師的指導與協助。關於長崎唐人屋敷的研究，可參考黃俊銘，《東南亞與日本華人街形成史的研究》，東京大學工學博士論文，一九九一，

- 頁一一四九。
6. 有關唐館中各建物的名稱主要參照成澤勝嗣，〈唐人屋敷通達—唐館図の変遷と展開〉，存於：大庭脩，《長崎唐館圖集成》，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二〇〇三，頁一八一—一〇六。
7. 同前註。
8. 唐繪目利是德川幕府於長崎所設立的官職，其工作主要在檢視、編目、複製輸入的中國及荷蘭繪畫，並紀錄官方的商品，這項職位於一六九七年設立，歷時一百七十四年。除了渡邊秀石的渡邊家外，尚有廣渡、石崎、及荒木等三家擔任這項工作的執行。
9. 永井規男，〈唐人屋敷—町の構成〉，存於：大庭脩，《長崎唐館圖集成》，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二〇〇三，頁一〇七—一〇四。
10. 有關坎弗對長崎唐人屋敷的描述見 Engelbert Kaempfer, *The History of Japan Volume II*, New York: AMS PRESS, 1971, p. 82.

十二），對於這個頗具歷史意義的文化遺產，目前除了能於畫幅中見其風采，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已試圖透過畫作、模型、動畫等各式各樣的呈現手法，將其樣貌展陳在博物館中。（圖十三）可惜的是，展示長崎唐館的單元中，資料多來自於日方的觀察，事實上，如同上文所述，江戶時期作為中、日、荷三方會面點的

長崎，包含唐館等的市景物，自然成為多方關注的焦點，例如任職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坎弗（Engelbert Kaempfer, 1651-1716），在其著作中大量敘述華人住宅及其生活樣貌（註十）；而來自中國的觀察，更是異常的精彩，院藏〈長崎貿易圖冊〉便是其中一例。這個用來侷限華人生活的「唐人屋敷」，所蘊藏的內容其實是

亞洲多元面貌的縮影，如何從多元的視角展示華人在長崎的精彩樣貌，進而擴大觀察的視野，呈現華人在東亞交織出的物質文化，應是未來可以持續探討的重點。

本文部分成果於二〇一六年設計史年會發表：另傳渡邊秀石〈唐館圖卷〉之圖版承蒙神戸市立博物館塚原景研究員協助提供，特致謝忱。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目前擔任荷蘭IAS Affiliated Fellow, 2016/10-2017/7）



圖13 唐館模型 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 作者攝

餘論

基於商業貿易的需求，華人在十七、八世紀藉由唐船連結東亞各個重要港市，順勢為亞洲藝術與文化的形塑，扮演起推波助瀾的重要角色。在所有的港市中，位於日本的長崎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據點。因應江戶幕府鎖國政策而產生的長崎唐館，成為經營亞洲物質文化的中心。唐館從設立至燒毀共歷時約一八一年，目前原址除了以「唐人屋敷跡」的石樁作為標示，還可見原入口位置矗立了一座新的城門。（圖十一）這座近年才落成的大門，並未依循原來日本「大手門」的樣式重作，反而以充滿中國特色的造形重新建造，筆者認為這樣的做法引發了一個有趣的思考點，清宮時所見的日式唐館大門，恰好讓觀圖者獲得此處所具備的異國（日本）資訊，隨著時間的更迭，今日為了提供各地旅人對不復存在的「唐人」屋敷有直接的視覺連結，中國式的大門反而提供了充分的指標訊息。至於部份的建築構件如內門，則移至與華人頗具淵源的興福寺（即南京寺，圖